一扇洞察传统文化精髓的窗口

——王蒙新著《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读后

□卜 键

第一次阅读王蒙先生解读古代经典,进而认知中华文化的作品,应是在30年前。那时的他迷上了《红楼梦》,在《读书》开设研红专栏,在三联推出《红楼启示录》。也应聂震宁之约,为漓江出版社搞了一个评点本,使得红学界一派叹羡。犹记得冯其庸先生的赞赏倾慕,叮嘱在《红楼梦学刊》做编辑的我登门约稿。由此,我走进朝内北小街的那个小院,初识作家王蒙的学术情怀。

略如创作小说时的状态,王蒙在治学上也是身心合一的,有对元典的细读精读,要吸纳权威及最新的研究成果,更要得到真知与正解。痴迷,似乎不宜于形容一个哲人和智者,可他真的会如痴如醉,会为某一语词或典故穷极搜觅,也会为获得新解洋洋得意。后来王蒙研读李商隐的诗,研读《论》《孟》《老》《庄》,研读《荀子》《列子》,都各有一段痴迷,各有一份心得。30年间,他对古代经典的兴趣从未消减,由此及彼,由点到面,以攻坚的姿态进入一个个专题,复以愉悦的心情书写自己的知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正是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在大量深入的个案研究之后,王蒙先生开始对中华文化作出整体思考与评述。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重点收录了王蒙在2020年的专题演讲,也可视为其最新的成果。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王蒙是一个笃实审慎的践行者。他的新著选择以问题为主轴,建构起独到的理论框架。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作者拈出"泛道德论""泛哲学论""泛相对论",而所谓泛,意在广泛与重视,并非浮泛。他说:"泛道德论就是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根本,尤其是把政治道德化,把做人道德化,把学问道德化。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书中举了历代王朝更替的例子,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变更中,儒家的孔子力图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道德规范,使父子、夫妻、君臣之间能有一个规矩和约束"。王蒙还引用了孟子的性善说,解释"礼义""伦理""情义"的人文内涵与局限,皆见精彩。作者以汉字的词源结构为例,提出中国文化的泛哲学论,"中国自古以来注意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性,注意字形的结构与逻辑"。至于泛相对论,则引用了《论语》的"愚不可及",《庄子》的"内圣外王",以及《红楼梦》中秦可卿"盛极必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登高必跌重"一段话,化艰涩为灵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经典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多为世人不解或误解,一经抉发阐释,便使人豁然开朗。

第二篇"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政治-文化理念",则从天下为公、以德治国、中庸之道等八个方面论述,立足于绌绎具有时代价值的精义。绌绎精义,是说王蒙并不迷信古人的说法,与一些"国学家"的盲目崇拜截然不同。如其讲述以德为先、以德治国的实践意义,接着便说:"如果我们认为今天还可以用《三字经》和《弟子规》就能够治国平天下,那是做梦。那不是'中国梦',那是傻梦,是封建梦、旧梦。"而在一一缕述之后,在全文之末,他再一次强调:"我们有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有文化的而且深入人心的一套治国理政观念,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破除这些观念。但是我们要给予补充,给予关于法律、法制、司法监督,关于规则、竞争的补充。"这是王蒙式的表述,字里行间机智且趣味横生。

王蒙也尝试从不同角度观照传统文化,在以"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为题的演讲里,提炼出"积极性、此岸性和经世致用性",戏谓之"极简版"。作者的研究也具有鲜明的此岸性。就在这个极简版中,他不独分析了中华文化提倡学习、自强不息、立足现实等特征,也对其曾经讲过的"三尚""三道"再作阐发。而在结尾时,王蒙先生话头一转,联系到正在进行的抗疫斗争,说:"中国人过苦日子经验的确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并没有在苦日子面前丧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所以我们的奋斗确实在全世界也是有名的,我们今天谈传统文化,就会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是中国的骄傲,是中国的力量所在。"真切平实,读来令人鼓舞和感动。

很喜欢录入本书的"对话"和采访记,喜欢看王蒙先生提到的往事和时事,以及那无处不在的真性情。作家何向阳所说"您个人的青春年代与共和国的青春是同频共振的",深深触动了王蒙,他表示:"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只有了解王蒙的早年坎坷,才会懂得这番话所饱含的赤子之情。数年前王蒙先生发表了《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磅礴氤氲,堪称雄文。而在这次接受采访时,他又讲到"真正的文化自信拒绝大言空洞、夸大其词、巧言令色、形式主义;真正的文化自信具备抵制低俗化、浅薄化、哄闹化、片面化、狭隘化的能力和定力"。这也是出自中国文化的辩证思维,出于君子之道。

"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说的是一位唐代歌女的音乐奇才,清末戚蓼生《石头记序》曾亦以之称赞曹雪芹文字之妙。王蒙也是这样一位奇才,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且老而弥坚,终日乾乾,阅读思考和写作不辍。致敬王蒙!为他的温情回望,为他的执着与通透,也为他真纯不染的家国情怀……

《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
王 蒙 著 人民出版社

(作者系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灯火漫卷照我心

——读《远山灯火》

□海 飞

光明书话

世界上什么最宝贵?是人,是生命,是尊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之中、民族之林,必须有自己的国家尊严、民族尊严,要有自己的"国魂""民族魂"。对历史的尊重,对英雄的敬仰,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情感以及愿为之奉献一切的初心,便是我们的"国魂""民族魂"。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个历史事件面前,全中国都在回望历史、记忆历史、总结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展望民族未来。

少年儿童是未来的生力军。针对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的儿童文学主题出版多以红色经典小说和历史小说为主,选取历史的某一个剖面,书写特定时代的童年生命。而日前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远山灯火》,以儿童视角贯穿时代进程,以党员奋斗史呈现党的发展史,用别出心裁之笔绘就了一派跨越百年的别开生面之景。这固然是一部打上鲜明的主题出版烙印的作品,却不失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艺术特色。我认为,这"灯火"既是一束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红色灯火,又是一盏肩负知识分子担当的文学灯火,更是一道引领青少年成长的精神灯火。

一束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红色灯火

锁定童年视角,锁定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描写百年巨变,是《远山灯火》的点睛之笔,也是这一束红色灯火震撼人心之所在。可以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鲜有一部儿童小说能在十几万字的容量内呈现串联百年历史却又不失真挚细节的恢宏气象。

小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笔,通过一位老共产党员深藏功名、忠诚奉献的一生,串联起不同时代三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而塑造了内心丰富、个性独特的共产党员群像,展现了几代共产党员的精神面貌,也使艰苦岁月中的励志少年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革命历史时期的共产党人,还是新时代的人民公仆,身上都闪耀着党性的光辉,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坚定意志构筑起震撼人心的庄严之美。

为新中国的英雄和奋斗者们立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远山灯火》一书的核心人物梁满仓可谓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典型代表。他战功赫赫却深藏功名,回归故土;迟暮之年仍心系祖国未来,发挥余热。在奔赴罗布泊前被秘密转移之时,即使想到"不知道他的生死,亲人们该有多担心啊",他也能立即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肩负着至高无上的'国家使命',去执行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战争年代冲向战场,和平年代走向僻壤;可以安逸的时候选择奋斗,可以享受的时候选择奉献。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愈加能够进入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岁月,为那些真实、坚毅、无私的人物所感动,也愈加能够理解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也恰恰以最真实的、还原历史的方式,阐释了共产党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得到那样前赴后继的誓死追随。无论历史的天空如何变幻,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忘我奋斗的理想信念是不变的。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最具穿透力的红色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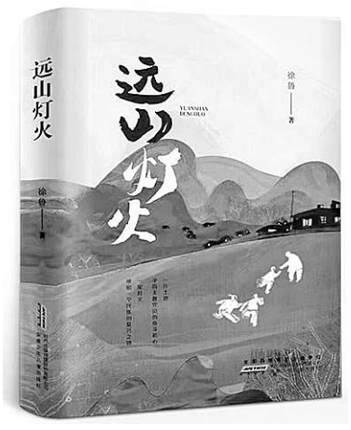
一盏肩负知识分子担当的文学灯火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历史是个"大"概念,儿童是群"小"家伙。似乎童年无史,因而儿童缺史。当作家以独特的胆魄和气度,将创作视野投向百年党史进程中的童年与成长时,他也诠释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历史承担和对文化使命的深切体认。

在《远山灯火》中,作者徐鲁以一种"史说"般的气魄,将百年党史的脉络编织进小说文学表现的经纬中,把文字的根须伸入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大胆地用童年视角、童年记忆、童年故事,呈现出具有史诗质感的家国变迁、党史足迹和英雄故事。徐鲁是用儿童视角观察历史的高手。例如,他在书中借12岁的农家少年梁满仓之口,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有党"与"无党"两幅截然不同的民间生活图景,从而有力地揭示了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什么"为人民服务是党员永远的初心"。

全书巧妙运用倒叙写法,以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经典作品《一块烫石头》开篇,以"如何才算无悔地过完一生"这一终极提问引出一位独臂老人回望自己本色人生的故事,这样的写作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再现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双重功能。

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年龄段,不同的童年个体,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部《红星斗笠》书写革命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浴血奋斗,让人热血沸腾又肝肠寸断;中部《青松翠柏》独具匠心地关注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这一段历史,同时以书信体的形式将英雄精神和少年的励志向上结合起来,直接叩响少年读者的心门;下部《山高水长》呈现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气象,通过点明对当代少年的红色教育,进一步升华了作品的主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童年,从童年的视角阐释历史,进而实现了讲述童年和讲述党史的双重意义,使红色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远山灯火》 徐 鲁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道引领青少年成长的精神灯火

鲁迅先生曾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一批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红极一时,红遍全国,给广大少年儿童带来了一个竞相阅读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浪潮。这个"红色浪潮"是积极向上的,是充满喜悦的,感动、影响、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质量、出版、传播、引进、输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儿童文学迅猛发展的全局相比,与迎合大众读者的商业化阅读浪潮相比,红色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发展却显而易见地滞后了。

今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历史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全社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浪潮中,"红色浪潮"阅读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潜移默化的红色教育,是广大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基石。

《远山灯火》中特定的历史节点选择与相应的题材表现,显然包含了让今天的孩子了解和铭记过去以及给他们"补课"的意图。在《远山灯火》中,有一批值得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他们是一批栩栩如生的在艰辛与磨炼中成长的儿童形象:农家少年梁满仓,在战火中跟随队伍茁壮成长;山村孤儿夏湖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对荣誉的向往和英雄的鼓励中成长;"偷书"男孩魏书槐,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成长。当三个少年的命运衔接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对百年来"少年强则国强"局面的生动展示。

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党史就是最好的营养剂。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才能更好地引导青年一代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构筑精神大厦。

远山灯火,是一脉永远值得少年风雨兼程的远山,也是一簇永远照耀中国的灯火。

中国要"站起来",少年冲锋在战斗前线;中国要"富起来",少年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中国要"强起来",少年胸怀理想,面向世界……此中少年,是"美哉我中国少年"。

(作者系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中国版权协会原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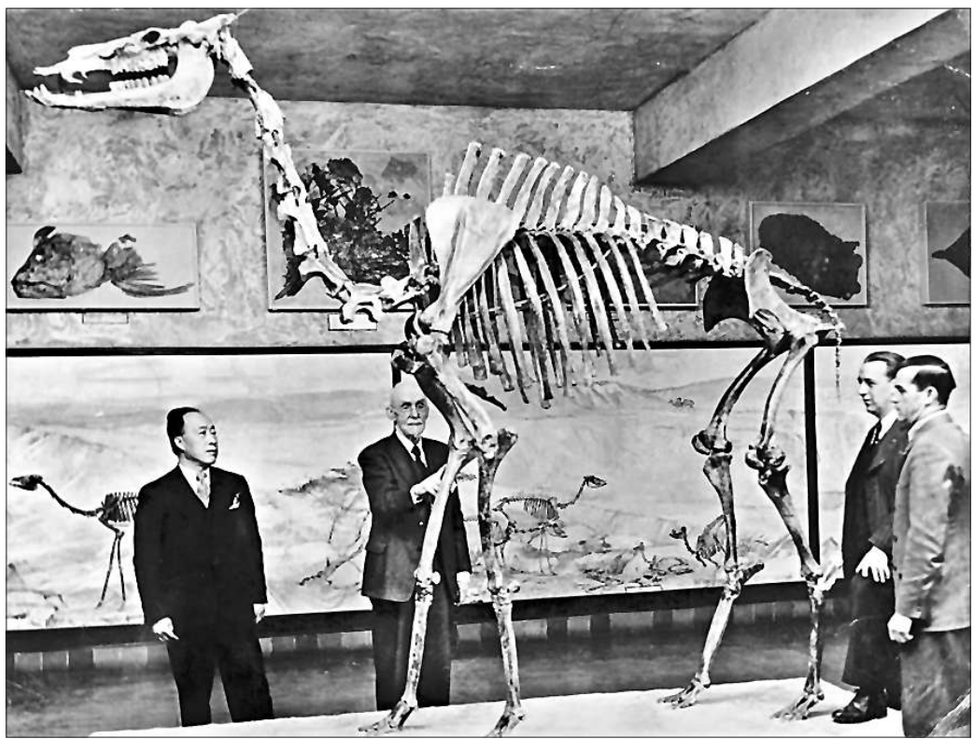
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

——读"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的游记

□曹明明

游记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体裁,特殊人物在特殊时期的游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杨钟健先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恐龙研究专家,被业内尊为"中国恐龙之父"。除专业研究之外,他涉猎丰富,不仅精通英语、德语,还熟悉拉丁文和希腊文,热爱诗词和散文写作,在长期的野外考察过程中,非常重视记录自己的所行、所见、所思和所想。他一生所作七部游记,分别为《去国的悲哀》《西北的剖面》《剖面的剖面》《抗战中看河山》《新眼界》《国外印象记》《访苏两月记》。这些记录的"剖面",此中含义一为实际观察到的地层剖面,反映其地质构造和科学内涵;另一则为人生的剖面。三联书店此次将其合并为三本出版,以飨读者。

《去国的悲哀》是杨钟健第一部游记,记述了1923年去德国留学以及归来的经历。旅途从故乡陕西华县出发,经北京、上海,以海路赴欧,在船上途经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到达欧洲之后,在慕尼黑、巴黎、柏林、伦敦、瑞士游历博物馆以及做地质考察,后从慕尼黑取陆路经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再由西伯利亚入东三省而归国。前后历时近五年。年轻时的杨钟健,求学之余喜欢参观欧洲的博物馆和著名的大学,对欧洲科学人文的发达、人民的外貌和精神状态,都感到新奇。而国外国内云泥之别的境况,也令他备受刺激。诚如他所言,此次旅程充满了"欣喜和悲戚",并不能完全融入求学旅途的欢乐,也不能完全畅怀。杨老一方面对国内情势终抱乐观态度,但同时也对胜利的一日何时到来充满未知感。他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大力发展科研、科普宣传的必要,但同时又以自己不过得一博士"虚衔"自卑,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慨。这种心情为此书带来一种时代的沉重感,的确与书名中"悲哀"二字紧紧相扣。



杨钟健与巴伯、舒尔茨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参观(1944年)。 资料图片

"杨钟健游记集"
杨钟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该书于1929年初版时,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包括封面的绘图者姬德邻先生,以及为本书作序并画插画、题写卷首诗的王德崇先生。他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与杨钟健相识于"共进社",任《共进》刊物主编,一起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痛斥军阀。1939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在农业经济学术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农场管理学》等。他自幼聪敏好学,是一位进步青年,且颇有胆识勇气。杨钟健先生与之交情甚笃,视其为"相知"。《去国的悲哀》前面几部分即是以写给王德崇的信件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字里行间可见二人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默契。

书中提及与作者有交谊的人物,皆为一时之秀。在此,举一人为例。孙云铸先生为我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留学于德国哈勒大学,1927年,与杨老在哈尔茨地质旅行途中相会,二人计划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此实为我国古生物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杨老写完《去国的悲哀》,将稿件交与北平平社编辑出版,就又出发了。他受翁文灏先生嘱托,去往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旅行调查三个月,又去东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古二连浩特东部一带,最后是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由张家口出发一直向西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杨老将这四次旅行的经过和感受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灏作序,于1932年出版。杨老称"几乎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等等",无一不"或深或浅地切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考察团和中法科考团这两次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杨老作为亲身经历者记录的详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剖面的剖面》记录了杨钟健先生于1932—1936年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两广等地所进行的地质、古生物考察和调查活动。杨老照以前一样,将旅途中所观察、感悟到的内容记述下来,成为一部游记。何为剖面?正如翁文灏在序中所说,"就是把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解剖开来"。关于此游记的内容,杨老概括有三:第一记地质知识,第二记沿途风景,第三记民俗风物。特别强调,旧时有的游记,有着很美的文字,也是不朽之佳作,然而描写并不合乎事实,如言山必定壁立千仞,说月无非玉兔嫦娥;更有甚者,游龙门必提夏禹,过吐鲁番必称火焰山。因而新式游记则须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对每一地的地质背景、地理状况和人情风物,均予以正确的记载。这种写作意图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更为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被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沦陷,杨钟健带着悲痛的心情于当年11月离开,经湖南、云南、四川、陕西,再游新疆,至回到北平,前后历时六年。此次野外旅行是在国土沦丧、时局艰难中进行的,杨老尤感我国山河之美、物产之丰,用"锦绣山河""地大物博"并不足以说清楚,而应该以实际的描写和科学的解释予以记录。更重要的是,杨老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自然地理均有翔实考察记录,而我国边疆地区丧失多年从不见有相似书籍出现,不免惊心,深感地质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要。

这两部书的出版都颇为不易,《剖面的剖面》尤其充满波折。此书完稿于1937年,交付禹贡学会的顾颉刚,拟送商务印书馆加入"禹贡丛书"出版。是年恰逢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商务无法印行,原稿也不知踪迹,直到1950年方才找回。1973年,杨老高龄,仍念念不忘此稿出版,曾求助于同人,甚至称"用纸可以次一些,印的份数可否压缩到三百份或四百份,插图和图版加价太昂可以去掉"等等,言辞卑微恳切,令人闻之心酸。即便如此,仍未能如愿。直到2008年该书才首次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今次随另外六种游记一同再版,真有回归之感,令人不胜唏嘘。而《抗战中看河山》虽然写完即交由独立出版社出版,但也非常不易。按照作者原来的计划,会在书中加入路线图和风景照片若干,也因战时艰难未能如愿。而翁文灏先生忙于政务,也未能拨冗赐序,颇为遗憾。但杨老仍然对慷慨帮助过的卢逮曾先生表示了诚恳的谢意,意识到"目下此等困难情形下,印刷这个似乎不重要的书籍,是不容易的",显示出学者的豁达。

中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翁文灏先生说,"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锥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寻远古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头之外,所经地方的山川形势人情物产种种都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往往与我们的石头有关","这些游记正是杨钟健先生科学观察而通俗写作的结晶,也是许多读者借此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